

2015年鲁迅研究述评

崔云伟

(山东艺术学院 艺术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2015年鲁迅研究依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在平淡从容中出现了诸多热点和亮点。宋剑华、勒新来、刘春勇、高旭东等皆对鲁迅小说发表了极为精彩的看法。汪卫东、彭小燕、朱崇科的《野草》研究均可称得上别具一格。张克、刘春勇的鲁迅杂文研究,文贵良、路杨的鲁迅整体研究皆有其新颖独到之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为十个专题:鲁迅与五四、鲁迅的精神信仰、鲁迅的精神特质、鲁迅的当代性、鲁迅与革命、鲁迅与政治、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鲁迅与外国文化、鲁迅与东亚、鲁迅与自由主义等,郜元宝、汪卫东、谭桂林、杨义、李春林、王得后、李玮、孙郁、赵京华、张松等的文章皆堪称优异之作。李冬木、潘世圣、张钊贻的史料研究,傅承洲、刘克敌、刘东方的鲁迅与学术研究,皆能予人以新的感受和认识。

[关键词] 鲁迅; 作品; 思想; 史料; 学术; 述评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6)03-0091-09

进入21世纪以来,鲁迅研究已经发展到了第15个年头。与往年相比较,本年度鲁迅研究依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在平淡从容中出现了诸多热点和亮点。作为鲁迅研究历程中的一木一石,其价值与意义是自在其中的。

一 鲁迅作品研究

(一)《呐喊》《彷徨》研究

宋剑华《“未庄”为何难容“阿Q”》^[1]着重思考了《阿Q正传》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阿Q正传》的创作主题,与鲁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狂人日记》和《长明灯》这两部作品,是表现文化个体从内部去攻击文化共同体的失败结局;那么《阿Q正传》则是通过寓意性的故事叙事,去表现文化共同体对于外部文化因素入侵的强烈抵制。在《阿Q正传》中,鲁迅所留给后人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厚重感的深刻认知,以及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激进情绪的批判性态度。悠着点,慢慢来,这才是鲁迅本人文化变革思想的本质所在。其《“呐喊”何须“彷徨”》^[2]亦深刻揭示了文化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性。文章指出,鲁迅从“孤独者”与“狼子村”的思想对峙中,发现了构成乡土中国文化“长明灯”的历史原因:“庸众”与“庸俗”作为乡土中国的强大势力,一直都在

以其强大的社会存在,与作为精英意识的儒学礼教形成对抗。因此,在鲁迅看来,“庸俗”与“礼教”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概念,反“传统”的重点应首先放在反“庸俗”方面,这才是《呐喊》与《彷徨》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真实表达。该文将鲁迅反对“传统文化”、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一转而变为反对“庸俗”与“庸众”。这一观点尚待学术界的进一步论争。

“致广大而尽精微”,这是靳新来^[3]在阅读《狂人日记》时所领略到的至深境界。他认为,尽管在《新青年》的语境下,鲁迅努力保持了与时代共鸣的和谐一致,但是他又尽力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言说,将之聚拢并隐含在小说尾声中。小说尾声,看似无关宏旨的点缀,其实是“最鲁迅”的。无论是对传统文化根基的撬动,还是对中国人生存危机的展现,无论是关注人物灵魂的痛苦,还是揭示历史留给女性精神上的癥痕,都无不昭示着小说“反传统”文化主题的开拓和深化,彰显出鲁迅卓而不群的精神个性。概之,将《狂人日记》置于《新青年》语境中解读,固然让我们加深认识到这一文学经典确实极好地从“宏大叙事”角度表征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更重要的却是让我们从文本近乎琐碎的细节和褶皱中再次认识到那“伟大的时代”所掩抑不住的一位“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人”。

鲁迅在其创作中,描写过不同类型的女性,其中

[收稿日期] 2016-03-12

[作者简介] 崔云伟(1974-),男,山东邹平人,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着力最多的是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子君。张娟^[4]从娜拉的中国化传播和早期中国的城市语境出发,认为《伤逝》实质是对《玩偶之家》开放式结尾的进一步思考。鲁迅在《伤逝》中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的判断,指出经济话语、日常话语、身体话语在城市知识女性命运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成就真正独立自信的娜拉,需要整体社会文化的建构。从日常生活理论、性别语言、福柯的“权力”理论等角度透视子君的“失语”,可以看到鲁迅借助女性问题,发现了中国早期城市社会中潜伏的身体与精神的矛盾、传统与启蒙的矛盾、个人追求与社会体制的矛盾、男性霸权与女性话语的矛盾等等,这些均成为了鲁迅思考早期中国市民社会的一个重大契机。

(二)《故事新编》研究

刘春勇^[5]认为,鲁迅的“文脉”其实就是从现代性的“文学”而向前近代的“文”退变,从而“超克”现代性的一种写作走向:《狂人日记》之前的留日时期,鲁迅信奉着笛卡尔意义上的具有“主观内面之精神”的主体形而上学的虚无世界像,践行“纯文学”的观念。《狂人日记》之后,一直到《写在〈坟〉后面》这“之间”,其基于主体形而上学之上的“纯文学”观念渐次崩毁,先前的虚无世界像逐渐退场,虚妄世界像得以建立。这个“之间”的时期,正是鲁迅经由从《呐喊》、“随感录”到《野草》《彷徨》再到《朝花夕拾》的写作时期,《写在〈坟〉后面》是为这一替换的终点。其后,鲁迅的“杂文时代”开启。鲁迅的杂文其实质是文章的写作,也就是章太炎所强调的“文”。《故事新编》也正是这样一种“文”的写作,它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写作,而是以“类小说”形式写成的“文”。《故事新编》当中的“油滑”问题其实也应该放在这样的一个“文脉”当中才能理解。只有当鲁迅的世界像从虚无渐次转向虚妄之后,鲁迅的精神才慢慢地显现出同这个世界的和解,这个时候,鲁迅的文字才开始逐渐通透明亮起来,“油滑”才成为可能。该文对于鲁迅的“文脉”从“文学”到“文章”的梳理堪称奇崛大胆,对于《故事新编》的读法也别具一格,这就在之前仅仅把《故事新编》定性为“杂文化的小说”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还有,胡志明对《故事新编》中体现的时间诗学的考察,可以说也别有一番新意^[6]。

(三)鲁迅其他小说研究

高旭东^[7]认为,《斯巴达之魂》是鲁迅留日时期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第一篇作品,它试图给中国的国民性注入一种奋力抗敌的阳刚性格。其后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推崇拜伦、尼采的恶魔风

骨与强力意志,五四时期批判中国国民的阴柔性格,以及后期在历史小说中通过大禹、墨子弘扬社会责任感和正义精神,都是以《斯巴达之魂》为源头,一以贯之地表现了鲁迅文学传统中刚健雄大的力之美以及硬骨头精神。鲁迅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对鲁迅之为民族魂的诋毁皆属无中生有。对这篇作品的修辞以及它以文学之笔改动历史、主体部分是虚构等方面的考据与论证,说明《斯巴达之魂》有编辑成分,但仍可视为鲁迅的第一篇历史小说。当代中国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民族魂,鲁迅研究界应更加关注《斯巴达之魂》,并就这篇作品的性质及其当代意义发出科学、理性的声音。

(四)《野草》研究

汪卫东^[8]认为,《野草》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抗击“虚无”的经典文本。“虚无”,处于文化最深层,东、西方文化对“虚无”的体验与超越方式迥然有别。在有神论的文化背景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发现“彼世”的虚无,诉诸思想史的洞察,开启了现代性之门;《野草》发现的是“此世”的虚无,基于无神论的东方背景,来自感性个人体验,诉诸否定性的东方悟性,展现为现实生存的黑暗、生的厌弃与死的诱惑。但《野草》反抗“虚无”的方式,则与东方固有的将“虚无”自我化与审美化的解脱方式拉开距离,通过直抵死亡的追问,最终在“虚妄”之后,重回生存的大地,以肯定性的、确定性的方式重新发现生存的价值,遂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殊途而同归,显示了跨文化的卓越努力。

同样是关注“虚无”,彭小燕^[9]则从整体上将《野草》大致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音乐单元。她认为,整个《野草》讲述的是:一个立于“苦难—黑暗—虚无”之世的生命主体,如何启动、完成他“决战虚无”的存在之旅。这一解读秘密隐藏于《野草》最“消极”的《墓碣文》和最“积极”的《这样的战士》之间。它在20世纪40年代的竹内好那里几近“去蔽”,遗憾的是,其结论未能清晰呈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木山英雄眼中,其秘密俨然可以揭示,但他又否定了自己的“发现”。

与汪卫东、彭小燕不同,朱崇科^[10]关注的是《野草》中的“立人”维度及其诗学。他认为,鲁迅的《野草》中有丰富的哲思,其中,“立人”思想也有其整体性观照。如果从单篇思考来看,他既有借助自然的抒情性策略,呈现出他对立人姿态和立场的描绘和情感投射(比如《雪》),又有对这种思想的中国践行可能性反思,呈现出对“立人”思想的具化和丰富策略(如《这样的战士》);也借助“互文性”诗学,无论

是从立人思想正面/负面的繁复性考量还是从更宏阔的意义关联上都呈现出别致的匠心(如《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从此视角看,《野草》真是鲁迅的精心创制,有不可踵武的经典性。

(五) 杂文研究

本年度有三篇文章同时论及《阿金》^①。张克在将阿金的力量定性为“越轨的都会之‘恶’”,在对阿金与阿长做了意味深长的比较之后,面对着世界的“阿金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阿金》一文,可视为鲁迅在光怪陆离的上海都会生活里,对底层人物的感受中,直觉到的对中国社会在大转型期所需的,一方面强悍、冲动、有力量,然而另一方面又会呈现出“野人其形”的样态,甚至还会带来对传统的伦理秩序产生极大破坏的近代精神——“浮士德精神”的某种直觉。在这个意义上,《阿金》里“自有阿金以来,四周的空气也变得扰动,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等言辞,并非夸饰的虚张声势;相反,这种深沉的恐惧感倒是显示了,即使是在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人代表如鲁迅那样强悍的生命身上,对“浮士德精神”仍然有着强烈的不适应感。这种不适应感,恐怕正是大多数中国现代文人在20世纪以降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中关于都市文明的种种言辞背后的真正心理动因。

刘春勇^[11]关注的问题则是鲁迅杂文文体的确立与“文章学”视野的关系。他认为,从《狂人日记》开始,经过《呐喊·自序》、《希望》的写作并最终抵达《写在〈坟〉后面》,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鲁迅扬弃先前的虚无世界像,向着其正在体验的虚妄世界像渐次转变的过程。其间,鲁迅扬弃了早期的“奢华的”纯文学观而回归其师章太炎质朴的即物性文学观:其实质是一种文章的写作观念,即杂文写作(不是创作)^②。这种写作其实质是一种反消失点的、反现代性体制的写作,而“有余裕的”、“留白”的美学观则是其成立的基本前提。该文从“文章学”的视野来研究鲁迅杂文文体的确立,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重新思考了鲁迅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的转变,为我们更好地理解 and 阐释鲁迅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六) 鲁迅作品整体研究

文贵良^[12]从语言学视角出发,认为晚清民初,鲁迅的汉语实践表现为“四重奏”。《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准白话译述,初步显示鲁迅把握白话的能力,同时也显示出白话与文言、汉语欧化的纠结。听章太炎讲解《说文解字》、《域外小说集》中文

言短篇的翻译,使得鲁迅形成“语言之伪”的观念。短篇小说《怀旧》的创作以及他的文言书写,表明鲁迅操控文言的自如状态,同时也表明白话在文言中的发芽。辑录校勘古籍,提升鲁迅精确地把握汉字韧性的能力,还影响着鲁迅后来文本形态的结构。这些语言实践,为鲁迅创作白话小说准备了必需的东西。

路杨^[13]以鲁迅文章中的“积习”修辞为中心,分析了“积习”否定性的字面意义背后的游移感与复杂性,在“古文与白话”问题的具体语境中,考察了鲁迅在现实态度与表达策略之间的张力,并最终上升到文章风格层面的讨论。路杨认为,鲁迅的语言方式在句式与修辞上的特点,正是对于白话文形态的现代汉语之精密性的锻造,它所提升的正是现代汉语对于复杂思想的表述能力。在文章风格层面,鲁迅的写作并不仅仅囿于“反讽”,而是更进一步地拓展了白话文写作在一个单一的文本单位内部,对于不同文体与不同风格的涵容能力。这正是鲁迅“杂文”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

二 鲁迅思想研究

(一) 鲁迅与五四

“德、赛两先生”在现代中国诸问题和诸价值中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果真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吗?这种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是否遮盖了“五四”期间甚至早在“五四”之前,就已经被有识之士提出来并加以深思熟虑的其他更为根本的问题?这是邵元宝^[14]所密切关注的核心问题。他认为,这些被遮盖的“问题”和“主义”主要集中在鲁迅身上。它们包括:(1)“科学”、“武事”和“制造商贾立宪国会”皆非本根;(2)“本根”即“神思”; (3)“涵养吾人之神思”的文学为“第一要著”; (4)文学与现代大学学术之对垒;(5)“经济权”、“革命”、“破迷信”与“写出灵魂的深”。由是,我们在纪念和反思新文化运动时最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重新发现因为独尊“德、赛两先生”而被遮盖了的许多可能比“德、赛两先生”更为“本源”的问题,否则无论如何热切地呼唤“德、赛两先生”,无论如何激烈地否定“五四”,或誓死捍卫“五四”,都是舍本逐末。

汪卫东^[15]则特别突出了鲁迅与《新青年》在当下的价值与意义。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政治和文学,都可以在《新青年》这里找到萌芽,而鲁迅则以其深刻性和复杂性成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但是,在今天由《新青年》所掀起的这场彻底的文化自我批判听来已有点逆耳,鲁迅与“五四”所开创的

20 世纪新文学传统,正在被人们遗忘。所以,在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追问“鲁迅文学”的意义。在晚清崇尚实学的潮流中,鲁迅逆流而动“弃医从文”,背后有全新的文学想象,有其独立而严肃的存在价值。面对沉沦于物欲的国人精神现状,在传统价值已经衰微的背景下,文学对于鲁迅,是重新激活国人精神的原创的精神行动。鲁迅文学,是召唤精神主体的文学。同时,鲁迅又将文学放在“致人性于全”的高度上来勘察其价值。在这一文明论背景下,鲁迅文学,以其善于涵养“神思”,在“当防社会于入偏,日趋而至一极”的意义上,具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

(二)鲁迅的精神信仰

信仰不仅仅是观念性的、精神性的,更是血肉性的,这是鲁迅生命信仰中的一大突出特征。谭桂林^[16]认为,在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里,以叶赛宁、梭波里等为代表的俄罗斯诗人的自杀,绝不是一个日常事件,而是一个信仰事件。这一非常态现象,促使信仰转换中的鲁迅对革命文学家的命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刻意突出和强调革命文学家“死”的前景与结局,使得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中并不执着于革命文学内容、性质、对象等问题的讨论,而是密切关心革命作家投身革命是听从内心的召唤还是受到前景的诱惑。鲁迅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选择了献祭,哪怕是要“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无疑这是一种最为纯粹的信仰,没有利益的牵引,也没有得失的考量,有的只是自我牺牲的对命运的承担。从“历史中间物”、“过客”、“诗人之死”这三个意象精神内质的相似性与联系性中可以断言,鲁迅后期信仰的转换与其说是一次飞跃,不如说是一种顺承和发展。对鲁迅而言,信仰的内容变了,但信仰的方式与信仰所赖以存在的生命激情则依然如故。

(三)鲁迅的精神特质

眼光、智慧、骨头、情怀,是杨义^[17]观察鲁迅精神特质和思想方法的四个关键词。鲁迅眼光的第一个特征是打破虚伪,祛除遮蔽,“诚以见真”;第二个特征是剥除涂饰,穿透迷雾,“锐以见深”;第三个特征是古今参证,中外比较,“通以发明”。鲁迅的智慧属于锋利型智慧,首先体现为精深的阅历省察的综合能力,其次体现为对现实和历史往返穿透的剖析能力,第三体现为杂文性,第四体现为非凡的机敏而锋利的比喻能力。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充溢着“不信邪,不怕鬼”的浩然正气。为了弘扬骨气,鲁迅竟然独出心裁地与鬼共舞。骨头可以安身立命,情怀

可以滋润生命。进入鲁迅的心灵深处,就会发现那里存在着丰富的好奇和温柔。鲁迅的存在具有斯芬克斯和莱谟斯的双重性,二者的综合成就了鲁迅“伟大的复杂”。唯有同时把握住鲁迅的思潮和血脉,才能切切实实地把握一个“全鲁迅”。

周银银^[18]则通过对于鲁迅与槐树之间隐秘关系的探讨进入到了鲁迅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深层。她认为,“补树书屋”的槐树在鲁迅的生命体验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无论在现实还是在小说中,槐树的“阴树”特征都与鲁迅身上的“鬼气”相契合;槐树的“茂树”特征又与鲁迅个体生命力的萎顿、人世变幻的无常相背离;槐树作为鲁迅与周作人曾经“兄弟恰恰”的见证,还成为鲁迅隐秘表达情感的机制。该文探求鲁迅与槐树的渊源关系,不但为深刻理解鲁迅“蛰伏期”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路径,而且由此出发,还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鲁迅研究领域:鲁迅与植物研究。

(四)鲁迅的当代性

李春林^[19]指出,当下形成了对鲁迅全方位、多样态的贬损和亵渎。其主体均系所谓“知识分子”。大陆新儒家则系中坚者。其之所以如此,是因鲁迅妨碍他们拒斥自由民主,主张复古更化,建立儒教国家的政治诉求。而鲁迅通过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而实现“立人”的人之解放伟大战略也使得基于传统文化的民族自大狂们不满。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站在权贵一边,鼓吹为奴的价值取向,借以谋求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这与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规范恰成反调。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结怨甚深,不单挖掘了祖坟,而且预言了子孙,所以他们视鲁迅为仇讎。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不变,贬损、亵渎鲁迅就会演变成为中国当下某些“知识分子”的“新常态”。其实,唱衰鲁迅,就是唱衰民族,乃是一种亡国之音。

曲彦斌^[20]则认为,当今的社会文化视野与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存在有文学家、思想家、民族魂的鲁迅,世俗生活中常人的自我鲁迅,被神化绑架劫持了的圣贤鲁迅,骂与论辩漩涡中的鲁迅,以及屡遭贬损诽谤被妖魔化的“五个鲁迅”,既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由于不同视点、不同取向、不同的主旨目的进行过度诠释的结果。“旗手与民族魂”是一个民族精神之所在,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之所在。无论是谁,一旦被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誉为“旗手与民族魂”,他就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个体的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而是一个凝结着民族智慧、民族正义与民族精神的伟人,一个不应神化、不可污损和诽谤的特定的文化符号。作为常人鲁迅无需捍卫,也捍卫不

了,但是作为“旗手与民族魂”的鲁迅,还是要捍卫的。

(五)鲁迅与革命

在鲁迅所生活的暴力与暴力革命的年代,鲁迅选择了支持暴力抵抗与暴力革命。王得后^[21]认为,鲁迅之所以如此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鲁迅具有强烈的自尊和不甘受辱的个性;(2)在鲁迅身上有着一一种强烈的家国复兴的责任心;(3)中国残酷的现实教训;(4)进化论思想之影响;(5)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之影响。鲁迅固然一方面赞同、支持暴力革命,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战斗不算好事情”,并教导自己的学生要学会运用“平和的方法”。鲁迅理想的改革方法是非暴力的和平的改革。因为暴力必然有所破坏,乃至牺牲人的生命,所以鲁迅的思想是严格限制战斗中的伤亡的。但是,这样严格限制牺牲,势必会削弱暴力革命的成果。这是一个极大的悖论。这不但是鲁迅的弱点、软肋,同时也是觉醒了的知识者的宿命。

1927至1936年,鲁迅在其后期杂文中对于自己曾经有过三种称谓:“蝙蝠”、“勃兰特”和“告警者”。杨姿^[22]认为,这三种意象的产生,同鲁迅在上海时期接触的社会情形、思想生态以及个人的精神结构调整密切相关,它们作为鲁迅自我评价的一种符号化体现,客观上也是鲁迅为文行事的参照与要求。三个意象前后相继地出现,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生关系:从蝙蝠洞察黑暗的独特方式,进而引申出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从勃兰特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得出革命手段的运用原则;从告警者参与革命的动机和行为,看到革命队伍建设的危机。三个方面共同形成了鲁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个性阐释。

(六)鲁迅与政治

李玮^[23]认为,1936—1942年间毛泽东从忽视到频频引用鲁迅的复杂过程,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毛泽东为何、如何引用鲁迅,其动机、方式和阐释的功能,展现出毛泽东敏锐的政治和文化论述能力。他逐步选择、引用鲁迅的“民族精神”、“革命精神”、“新文化的方向”,建构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在这一革命话语的建构中,不但鲁迅的历史意义得到了新的阐释和增殖,而且作为革命文化象征符号的毛泽东的诞生也具有了其历史的必然性。毛泽东之所以在不同阶段不断引用鲁迅,其原因正在于鲁迅满足了他建构新的革命文化的意愿和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引用者毛泽东和被引用者鲁迅之间的历史互文体现着参与20世纪中国现代进程的历史力量之间的关系。该文最大的特色在于论述视角

的转换,即不再单纯地拘泥于政治和文化非此即彼的二元化论述,而是首先把关注点放置于历史的断续是怎么发生的。该文还在有意无意之间采用了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的“文化需要”理论,揭示了毛泽东在引用鲁迅时的现实功利性,这些都为我们在分析与之相类的文化现象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和一个鲜活的个案。对鲁迅与政治作出解读的还有张宁^[24]等。

(七)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

郅元宝在重读《白鹿原》^[25]时,认为《白鹿原》在“寻根文学热”沉寂多年之后继续“寻根”,但其所寻之“根”糅合儒、佛、道而以道教文化为主导,不啻为鲁迅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下一注脚。性、暴力、污秽场面的大量描写也与此有关。《白鹿原》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含蓄相对立的倾向暴露的另一传统,这在当代文坛亦非孤立现象。同样为鲁迅的这一句话下一注脚的还有张炜的《古船》^[26]。在郅元宝看来,不论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还是张炜的《古船》,可以说都以其文学形式出色地揭示了“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关于鲁迅的这一思想,长期以来没有在学术界得到应有的重视,郅文对于以上两部长篇小说的出色解读,可谓有力弥补了此一不足。

张明^[27]则认为,在狭隘的“正统一异端”眼界下,鲁迅对中国精神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与革新的思想,长期以来被遮蔽了。尤其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反思,至今仍然被简单定性为文化激进主义,认为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进而被有些人指责为造成传统的断裂。事实上,鲁迅从早年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到晚年的“拿来主义”,都是主张以开放的心态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以达到存续民族文化血脉的目的。他的批判性言论,并非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而是首次使中国文化传统具备了一种严肃的自我批判机制。

(八)鲁迅与外国文化

孙郁《鲁迅与俄罗斯的镜子》^[28]认为,五四之后,中国知识界对俄国文学与政治的介绍,局限在几个领域,许多思想家如别尔嘉耶夫等的著述被忽略了。鲁迅所关注的俄国文学,也受到日本、德国左翼的影响。这些有局限性的选择,妨碍了他对俄罗斯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在面对苏联作家的自身问题时,鲁迅将之归结于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没有思考外在的政治环境,这是鲁迅认识俄苏问题的短板。鲁迅的俄国观带有一种复杂的体味。这种复杂性是

指,鲁迅是带着晚清、辛亥革命以及五四的经验进入与俄罗斯文化对话的途径的。他发现在那些俄国知识分子的心头还有冬火的余光,并非都是彻骨的寒流。为了有效传达对象世界的精妙之处,鲁迅选择了一条硬译之路,为此不惜将自己置于整个译界的对立面,这正体现了他思想的不凡之处。有人说,鲁迅的翻译基本失败,但这只是一种偏颇之言。这倒从另一方面证明了鲁迅思想的逆俗意味。

孙郁《鲁迅:争论中的选择》^[29]则是对鲁迅与托洛茨基的研究。文章认为,鲁迅之所以认同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大概基于如下考虑:一是旧的知识人能否真的变为新生的革命者?二是以往的遗产能够支撑新的文化的因子何在?三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新文学的突破口应在哪里?直到1928年底,鲁迅对托氏印象依然很好,在艺术层面上对托氏的理解是深切的,有着心心相印的一面,但是由于鲁迅对苏联的了解是含混的,还不知道个性主义在苏联政权中的厄运,所以直到他死,托氏的存在对他仍是一个疑障。在革命的年代,鲁迅认识到自己的“同路人”身份十分尴尬,认为只有摆脱它才能进入到新的世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托氏的著作给鲁迅带来了希望的暗示。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对革命的认识,可能对其苦苦用心有另类的理解。

郅元宝^[30]关注的论题则是鲁迅与尼采。他认为,中国传统消极方面的刺激和积极方面的继承,是留日时期鲁迅接触以尼采为首的“神思新宗”的“期待视野”,也是他归国以后直到晚年仍与尼采周旋到底的来自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动因。懂得鲁迅的修辞法和上下文语境,就会发现,鲁迅文章中有关尼采的诸多评论,都不足以作为鲁迅抛弃尼采的证据。鲁迅像尼采一样坚持独立思考,也像尼采一样忠实于他所处的中国文化和现实语境。鲁迅一生没有离开尼采,并不等于尼采思想笼罩了鲁迅一生。鲁迅没有被尼采压扁,成为追求“超人”的“末人”。文学、语言、文体,使鲁迅更接近尼采,又恰恰因此而使鲁迅成为鲁迅,终于不为尼采所蔽。

(九)鲁迅与东亚

赵京华^[31]认为,鲁迅一生少谈日本,对于同属东亚区域的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也在思想文字里没有更多的表现,这的确是一个历史之谜。而这种情况又与他在战后东亚区域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力构成了巨大悖论。从东亚近现代历史剧变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出,鲁迅生前工作重心始终在于中国民族的自我改造,对本民族因袭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耗尽了他的主要精力。而在他身后,尤其是

1949年以后,在中国渐渐失落的以“反抗”为核心的“鲁迅精神”,却在异域经历新殖民压迫和民主化运动的日本和韩国得以广为传播,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其思想文学的“世界意义”。

(十)鲁迅与自由主义

张松^[32]认为,把鲁迅放在以胡适为代表的所谓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对立面并加以批判,似乎成了近年来时髦且具有某种道德色彩的事情。然而,鲁迅时代的中国是否真的存在什么自由主义传统其实是很可疑的。不论是胡适本人还是他在当代中国的拥护者们,似乎都还没有弄清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本身就包含着诸多的问题和内在矛盾,而从这些东西着眼,鲁迅思想所隐含着的与自由主义的某些不相容之处,正体现了鲁迅的深刻,因此,由于这种不相容而认为鲁迅反自由且倾心于专制,是极其荒谬的。而如果对鲁迅的批判的隐蔽目的就是为了指证这一点,那么这种所谓的批判则不过是一种极为粗鄙的且具有讨巧卖乖性质的情绪宣泄而已。事实上,鲁迅的批判者们用来指责鲁迅的东西也基本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没有什么关系。

三 鲁迅史料研究

在周树人留学时代关于“个人”的语境当中有个“斯契纳尔”,该人即为现在通称的“斯蒂纳”或“施蒂纳”。后来发现这个“施蒂纳”其实是来自一个叫“蚊学士”的作者发表在1902年《日本人》杂志上的文章,这是汪卫东^[33]教授的一个贡献。李冬木^[34]在此基础上,重新确认并重译了“蚊学士”原文,订正了汪文中的一些较为粗疏的译文,在细致比较蚊学士的《论无政府主义》和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的基础上,最终发现蚊学士就是烟山专太郎。继之,李冬木整理归纳了烟山专太郎的生平和著述情况,并细致梳理了其在日本和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的影响,进而还探讨了“蚊学士”与留学生周树人的思想关联以及后者如何在明治三十年代的话语中选择了“施蒂纳”。李冬木指出,除了施蒂纳材源和对“实行的”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外,周树人与蚊学士最大的“近似”之处,即在于“文化偏至”的文明史观与蚊学士的思想史叙述一脉相承。周树人在其“个人”语境中在择取施蒂纳时展现出了浓厚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文化偏至论》中的“施蒂纳”,是将“近世无政府主义”流变叙述框架中的一个“理论的”“无政府主义”者,编织到另外一个重构出来的“个人主义”叙述框架当中的产物,

虽然在后者的框架内仍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材源的内容,却使“施蒂纳”完成了角色转换,即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转变为19世纪个人主义精神谱系的引领者和叙述者。

“清国”留学生周树人与嘉纳治五郎的关联和交集,主要发生在留学“弘文学院”时期(1902—1904)。潘世圣^[35]认为,目前可见中日两国之资料文献,均无显示周树人与嘉纳直接交往或联系的纪录文字。但另一方面,深入了解周树人在那一时期的置身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知识和思想话语的情境后,会发现嘉纳以其独特理念和手法统帅运作弘文学院,构成了一个不同于其他的留学生教育观念和实践体系,周树人由这一时期开始,大幅度进入“现代鲁迅”的形成过程。尽管我们缺少诸如两者并肩欢谈之类的叙事素材,但在“嘉纳—弘文学院—周树人”这个关系结构中,存在诸多嘉纳的影响。两者关联的实质意义,不止于形式上的上下师生关系,更在于,嘉纳和他的弘文学院成为“现代鲁迅”形成的最早也是最重要、最独特的背景。鲁迅在此不但完成了日语习得,而且初步学习和掌握了近代的一般科学知识体系,实现了知识体系的现代转换,也就是获得了近代的基础文明体系。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结构形态,之前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关注,该文终于弥补了此一重大不足。该文标举实证学风,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便不说话,论证周密,逻辑严谨,环环相扣,滴水不漏,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张钊贻^[36]关注的问题则是谁邀请了鲁迅赴港讲演。他认为,对于1927年鲁迅到香港讲演一事,曾记录鲁迅讲演的刘随于1981年回忆称,香港大学黄新彦博士邀请并主持其事,他自己也是接待人员之一。1993年赵今声发表文章,称鲁迅是他邀请,并由他一人主理其事。已故中山大学李伟江教授曾为文辨正两说,认为刘说不可靠,应以赵说为是。但赵说误记香港没有新闻检查制度,虽经笔者(指张钊贻)纠正,仍存在一些未解之谜。这次发现报纸副刊检查的案例,进一步证明赵今声误记,而鲁迅等所说属实。另外,对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黄新彦博士,有进一步的了解。所谓有两个黄新彦的说法,并不成立,其实只有一个黄新彦,即作为化学家的黄新彦。所谓黄新彦邀请鲁迅一事,并非刘随发明,实出自黄新彦本人。但黄新彦邀请鲁迅之说不太可能,刘随看来也并不认识黄新彦,李伟江的结论仍属可靠。赵说更符合当时历史状况的原因之一,恰恰是他记述中牵涉众多的基督教人物和组织而受到质

疑的地方。赵说除了主要部分有鲁迅的日记支持外,还比较符合邀请者的意图和鲁迅讲演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经过上述辨正,赵说存在的一些疑团,也可以推出合理的解释。即,尽管赵今声名义上主持了这次邀请,但由于真正奔走其间的是叶少泉,所以赵今声反而成为了陪衬人物。

四 鲁迅与学术研究

傅承洲^[37]认为,鲁迅和胡适不约而同地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且都取得了杰出成就。两位先贤既有相同的学术背景与学术眼光,又有不同的研究动机与研究重点。二人都出生于清末,从小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史,爱看古代小说,这为其研究古代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十几岁便进新式学堂,后又出国留学,接受西方的学术训练与文学观念,故其古代小说研究明显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而他们研究古代小说源于不同契机。鲁迅受聘于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编写小说史讲义,系统论述中国小说的起源、发展及其规律;胡适研究古代小说是为了推广白话文运动,研究对象仅限于白话小说。鲁迅是著名小说家,有丰富的创作经验,这有助于他准确把握小说艺术特征。胡适对小说艺术的品鉴,与鲁迅相比相差甚远。但在研究过程中,互相提供资料、互赠论著、互引对方观点,交流频繁,这也是他们能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刘克敌^[38]则就鲁迅在中国小说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对民国时期相关著作的影响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具体的比较分析中进一步彰显了鲁迅小说史研究的独特价值,从而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论者继而细致剖析了鲁迅之后这些中国小说史不能在鲁迅著作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深层原因,在于写作者自身缺少“史识”。真要具备过人的“史识”,首先要求文学史家对本国历史不仅熟悉,而且抱有敬意;其次是文学史撰写者最好既是作家又是学者;最后还要求文人要有“史德”。这就为中国古典小说史的撰写早日走出“鲁迅时代”,尽早做出突破性成果方面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径。

刘东方^[39]则指出,鲁迅的现代学术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文化现代化的模型”,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既应“弗失固有之血脉”,又要“不后于世界之思潮”,才能“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的小说研究,继承汉学家校勘考证的学术方法搜集、整理中国的古代小说,运用西方学科的理念,界定了小说的概念,形成了科学的体系,发表了个人的见解,使其研究成为中国学术传统和西方科学理念完美结合的典

范,他的这种研究范式,完全可以为今天的现代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注释:

①这三篇文章分别是:张克:《越轨的都会之“恶”:〈阿金〉的挑战》,《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10期。朱崇科:《女阿Q或错版异形?——鲁迅笔下阿金形象新论》,《山东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中井政喜:《关于鲁迅〈阿金〉的札记——鲁迅的民众形象、知识分子形象备忘录之四》,陈玲玲译,《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②该文对于鲁迅“文脉”的梳理还可参见作者的另一篇文章《鲁迅的“文脉”与〈故事新编〉的读法》。

[参考文献]

- [1] 宋剑华.“未庄”为何难容“阿Q”?——也谈《阿Q正传》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J].鲁迅研究月刊,2015(1):31-40.
- [2] 宋剑华.“呐喊”何须“彷徨”?——论鲁迅小说对于思想启蒙的困惑与质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95-104.
- [3] 靳新来.致广大而尽精微——基于《新青年》语境下的《狂人日记》细读[J].鲁迅研究月刊,2015(12):4-10.
- [4] 张娟.知识、日常、身体的权力策略——鲁迅对早期中国市民社会知识女性命运的探讨[J].鲁迅研究月刊,2015(12):28-35.
- [5] 刘春勇.鲁迅的“文脉”与《故事新编》的读法[J].东岳论丛,2015(10):78-83.
- [6] 胡志明.故事如何新编——《论故事新编的时间诗学》[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29-134.
- [7] 高旭东.鲁迅:从《斯巴达之魂》到民族魂——《斯巴达之魂》的命意、文体及注释研究[J].文学评论,2015(5):5-14.
- [8] 汪卫东.“虚无”如何面对,如何抗击?——《野草》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深度比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1):33-44.
- [9] 彭小燕.“虚无”的意味——一份具有特定倾向的《野草》解读报告[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4-50.
- [10] 朱崇科.《野草》中的“立人”维度及其诗学[J].学术研究,2015(5):135-139.
- [11] 刘春勇.论鲁迅杂文文体的确立与“文章学”视野的关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12):108-119.
- [12] 文贵良.晚清民初:鲁迅汉语实践的“四重奏”[J].文艺理论与研究,2015(1):17-25.
- [13] 路杨.“积习”:鲁迅的言说方式之一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4):1-12.
- [14] 郜元宝.“德、赛两先生”所遮盖的鲁迅的“问题”与“主义”[J].探索与争鸣,2015(8):10-16.
- [15] 汪卫东.《新青年》:鲁迅与五四的“相遇”——兼及纪念《新青年》在当下的意义[J].文艺争鸣,2015(9):50-54.
- [16] 谭桂林.“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诗人之死”与鲁迅信仰转换中的命运认知[J].文学评论,2015(4):13-20.
- [17] 杨义.鲁迅给我们留下什么?[J].鲁迅研究月刊,2015(1):20-30;(2):4-15.
- [18] 周银银.复杂的缠绕——鲁迅与槐树的渊源关系探析[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33-37.
- [19] 李春林.贬损、褒读鲁迅:中国当下某些“知识分子”的“新常态”[J].文化学刊,2015(4):6-15.
- [20] 曲彦斌.厄议“五个鲁迅”[J].文化学刊,2015(4):16-28.
- [21] 王得后.在暴力与暴力革命的年代——关于鲁迅左翼思想的一点思考[J].书城,2015(4):5-14.
- [22] 杨姿.三个意象与上海时期鲁迅“革命观”的精神结构[J].江苏社会科学,2015(1):173-180.
- [23] 李玮.论1936—1942年毛泽东对鲁迅的引用[J].文学评论,2015(6):132-141.
- [24] 张宁.论鲁迅的“政治学”[J].文史哲,2015(2):118-133.
- [25] 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J].文学评论,2015(2):98-106.
- [26] 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古船》重读[J].当代作家评论,2015(2):9-24.
- [27] 张明.国学热语境中的鲁迅反传统问题[J].东岳论丛,2015(12):105-108.
- [28] 孙郁.鲁迅与俄罗斯的镜子[J].小说评论,2015(1):53-62.
- [29] 孙郁.鲁迅:争论中的选择[J].小说评论,2015(2):4-13.
- [30] 郜元宝.“末人”时代忆“超人”——“鲁迅与尼采”六题议[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0-53.
- [31] 赵京华.在东亚历史剧变中重估鲁迅传统——关于鲁迅对“东亚”的淡漠与他在战后该地区影响力的考察[J].学术月刊,2015(1):127-134.
- [32] 张松.鲁迅与中国自由主义传统:一个伪命题[J].山东社会科学,2015(12):29-37.
- [33] 张鑫,汪卫东.新发现鲁迅《文化偏至论》中有关施蒂纳的材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5):149-156.
- [34] 李冬木.留学生周树人“个人”语境中的“斯契纳尔”——兼谈“蚊学士”、烟山专太郎[J].东岳论丛,2015(6):55-73.
- [35] 潘世圣.留日时期的鲁迅与嘉纳治五郎[J].东岳论丛,2015(3):75-90.

- [36] 张钊贻.谁邀请鲁迅赴港讲演?——新材料的考辨与问题的再辨正[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38-49.
- [37] 傅承洲.鲁迅与胡适的古代小说研究异同论[J].河北学刊,2015(6):77-83.
- [38] 刘克敌.鲁迅与民国时期的中国古典小说史[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10):57-69.
- [39] 刘东方.鲁迅对现代学术文化的贡献——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例[J].鲁迅研究月刊,2015(9):12-21.

The Review on Lu Xun's Research in 2015

CUI Yun-wei

(Shandong College of Art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In 2015, the research on Lu Xun remained continuous. There were many remarkable works among these researches. Great views on Lu Xun's novels were made by Song Jianhua, Jin Xinlai and Liu Chunyong, etc. The study on Wild Weeds made by Wang Weidong, Peng Xiaoyan and Zhu Chongke was unique. Zhang ke and Liu Chunyong's study on Lu Xun's essay and Wen Guilang, Lu Yang's holistic study on Lu Xun have original ideas. Study on thoughts mainl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ten aspects: Lu Xun and May Fourth, Lu Xun's spiritual belief, Lu Xun's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 Lu Xun's contemporariness, Lu Xun and Revolution, Lu Xun and Politics, Lu Xun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Lu Xun and Foreign Culture, Lu Xun and East Asia, Lu Xun and Liberalism. The articles written by Gao Yuanbao, Wang Weidong, Tan Guilin, Yang Yi, Li Chunlin, Wang Dehou, Li Wei, Sun Yu, Zhao Jinghua and Zhang Song, etc, were considered to be outstanding. Both the study on historical material made by Li Dongmu, Pan Shisheng and Zhang Zhaoyi and the topic between Lu Xun and academic research made by Fu Chengzhou, Liu Kedi and Liu Dongfang gave us a brand new feeling and understanding on Lu Xun's research.

Key words: Lu Xun; works; thoughts; historical data; academy; review